

来华游记的东方主义模式化写作

——以福琼《两访中国茶乡》为例

敖雪岗^①

[摘要] 鸦片战争前后,西方来华游记的写作开始呈现出东方主义的特征,以西方为中心,囿于作者自身的母文化来观照东方文化。游记写作也开始凝固成几种写作模式,其一是将中国看成是个一成不变的客体,一个因凝固化而难以交流的对象。其二是将空间距离转换成时间距离,把中国说成是更早版本的西方。通过这些模式,西方获得支配、重构中国的话语霸权。英国植物学家福琼的游记《两访中国茶乡》是其先行者。

[关键词] 东方主义;游记;福琼

Orientalism in Robert Fortune's *Two Visits to the Tea Countries of China*

Ao Xuegang

[Abstract] In the time of the Opium War, travel writings by Western adventurers to China began to show the characteristics of Orientalism. With the West in the center, those narratives tend to define themselves against Chinese culture and Chinese people. Such travel writings follow a few set writing paradigms, and one of them is to regard Chinese culture as a static object difficult to communicate. Another paradigm is to convert spatial distance into time distance, regarding China as an earlier version of the West. Through such paradigms, the West thus obtains discursive domination over China. British botanist Robert Fortune's travelogue, *Two Visits to the Tea Countries of China*, is a forerunner.

[Key Words] Orientalism; travel writing; Robert Fortune

从马可·波罗来华旅行开始,后来又有欧洲方济各修士、耶稣会教士来华传教,到了十八世纪末期以后,更多外交官、探险家和商人来到中国,这些人纷纷留下中国旅行后的游记或书信,向自己的西方同胞介绍中国。这些游记性著作,随着时世的变化,以十八世纪末期为转折点,此前此后西方游者对中国的介绍大相径庭。鸦片战争以后,西方来华游记更是渐渐凝固成几种写作模式,在写作模式化的过程中,中国形象也渐渐凝固化,并将此中国形象传递给西方读者。

^① 作者简介:敖雪岗,南京大学海外教育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古代文学、文化教学研究,对外汉语教学研究。



正如美国人类学者博厄斯所说,你眼睛所看到的,都是由你生长的文化环境提供给你的(Stocking, 1968:145)。实际上,每个游者都是从自己的文化传统中形成了一些常识观念以及知识体系,然后用这些观念和这套体系来观照周围的世界,这样,世界对每一个游者而言才是有意义的。一旦游者遇到一种新文化,一种异质文化,他们就会意识到,他们对这个世界的认识并不是那么理所当然,他们可能认识到,自己对世界的认识只是对周边社会和自然进行构建的众多方法或者说可能性中的一种而已。这些异质文化有他们自己应对环境、相互打交道的一套方式,在这一过程中、组建起社会,发展出自己文化。

游客书写游记,或写作书信向国内介绍他国文化,书信和游记可以起到一种类似于中介的作用,在他文化和自身熟悉的文化之间调和一下,但具体是哪种调和方式要看他者文化与母文化之间冲突的强烈程度,有赖于写作者自己的选择,和写作者是否坚信自身文化与理念有关。

所以游记通常都带有自传性质,是作者个人内在和他所处时代背景的一种反映。作者来到一个新地方,他把自己看到的听到的都记录下来。作者记录这些东西的时候,其实也就是在对这个地方进行一次重构。对外国人来说,他要用自己的母语来介绍一个他国,介绍的过程也就是重构这个国家的过程(Porter, 1991:19)。这种重构,既是外界真实的反映,同时又是作者个人关注焦点和视野的反映,他关注哪些东西,记录什么东西,实际上都是他有意无意选择的结果。他对异域风情、物产、民俗的描绘,他对于这个国家的认识和体会,也因此打上了作者自己的职业经历、教育背景、思想、情绪等烙印。所有这些时代背景、个人经历等的烙印都将影响作者选择何种方式来处理他文化与母文化之间的冲突(Porter, 1991:14-15)。

元朝时来到中国的欧洲人的游记,改变了欧洲人的地理观。以前的欧洲人,特别是拉丁人,他们以耶路撒冷为世界中心,对地中海地区以外的亚洲和非洲极少有什么认识。在被蒙古征服的过程中,欧洲人逐渐更新了他们的地理知识,亚洲得到了全新的开辟(赫德逊, 1995:124)。继之而来的那些来华游客主要是些传教士,他们来到中国,面对一种全然不同的文化,为了顺利传教,他们采取由上到下的传教策略,所以对中国文化采用一种接纳包容的态度,不再依靠他那由母体文化传统塑造出来的双眼,而是试图从一种新构建出来的理念体系来理解他者文化。他们对中国有一个同情之了解,称赞中国的政治、道德哲学等制度文化上取得的成就,甚至不无仰视地看待中国,沿用中国人美化自己国家的说法,把中国称为“天朝”或“花国”,把中国看作是一个有着悠久历史和高度文明的古国,在文明程度上不低于西方世界。于是在写作介绍中国的游记和书信时,这些作品就都带有一些自我文化反省的性质。而这些游记和书信传到欧洲,引起同时代欧洲思想家的关注,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赋予中国文化以很高的价值。就像波维尔所写的:只要中华帝国的法律成为各国的法律,中国就可以为世界可能变成什么样子提供一幅迷人的景象,到北京,瞻仰世上最强大的人,他是上天真正完美的形象。伏尔泰也曾说:他们有最完美的道德科学,它是科学中最重要的(赫德逊, 1995:268)。他们都把中国看成一个完美的榜样。

十八世纪末期开始,特别是十九世纪以来,西方渐渐进入工业社会,科学技术、工业机器

对社会的控制力越来越强,他们对中国文化、中国社会的看法也发生了变化。其实,十五世纪以来,西方人头脑中有关中国的知识已经大大增长了,欧洲的有识之士,包括杜赫德,对中国科技落后于西方已经有较为清楚的认识,中国人对科技的兴趣也很少有提高。尽管杜赫德笔下的中国仍然受到高度赞美,但还是有一些暗示,中国社会那曾经赢得赞誉的成就已经过了它的巅峰,即使不是在走下坡路,也是停滞不前的。随着启蒙运动的结束,民主、科学精神在西方的深入人心,也伴随着西方人对整个世界的了解,比如非洲、印度等,到十九世纪,西方人已经确立了自己的优越感,将西方与世界的其他部分区别开来,他们通过对新发现世界现实的描绘,对非西方地区的历史、文学、文化、社会等各方面的批判性分析,把世界的其他部分看作是手术台上的病人或者实验室里的动植物标本,用显微镜或手术刀对它们进行观察和分析,从中产生出一种可以支配、重构东方的西方模式。中国和印度、非洲等地区一样,变成西方之外的一部分,失去了原有的光环,反映到这一时期的游记中,便是一种东方主义的写作方式。

十八世纪晚期和十九世纪初的西方游客们,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进入中国,他们带着对中国和中国文化的向往憧憬,希望看到他们在前人游记中看到的那些为中国赢得赞誉的文明场景,可是他们看到的却让自己大失所望,于是批评起来也就不遗余力,并逐渐形成了质疑中国,贬低中国文明成就的潮流。如果说英国给乾隆祝寿的代表团开始了这股潮流(何高济,2013),那么进入十九世纪中期,也就是第一次鸦片战争以后,随着英国等欧洲主要国家工业革命的发展和完成,这股潮流越演越烈,而鸦片战争前后,正是这股潮流逐渐成形的時候。这一阶段的西人来华游记,与此前西人游记有了明显不同,同时又开了后来西人游记的先河,逐渐形成了解读中国比较固定的几种模式,带有东方主义的明显特征,很值得关注;英国植物学家福琼的游记《两访中国茶乡》就是其中的典型。他对中国的观察、对中国的认识也因此和此前外国人不太一样,带有明显的时代特色,在某些方面开了后来西人游记的先河。下文便以福琼这本游记为例分析这些东方主义式的中国读解模式有哪几种,又有哪些特点。

二

东方主义的游记写作模式就是以西方为中心,囿于作者自身的母文化来观照东方文化(萨义德,1999:2-6)。具体到西人的来华游记,其模式有二,本节介绍第一种,即,将中国看成是个一成不变的客体,一个凝固化因而难以交流的对象。

十八世纪末期以后,科学观念在西方渐渐深入人心,来华游者在通过所谓科学考察之后,认为自己抓住、掌握了中国社会和中国人的本质特点。我们以福琼的游记为例,可以看到这种写作后面体现的思维模式。福琼因为与鸦片走私船一起待过一段时间,见识过清朝海军的行事方式,他于是断言自己发现了中国将领与军队的特点,他写道:

我住在中国的这段时期,中国政府在禁止鸦片贸易方面采取了很多虚张声势的作法。有时候,某位以英勇善战而知名的海军将官,也会受命带着很多战舰,开到鸦片船集中的地方,试图将这些船只驱离中国海岸。然而,士兵们敲着锣,隔着老远就放枪,战舰耀武扬威地来巡视一圈,中国人都很熟悉这一套路,而这看起来就是武力清剿的主要内容。与此同时,那些小鸦片船就静静地停泊在那儿,很明

显,它们对这场大张旗鼓的示威行动并不怎么关心。于是带队将领马上颁布了一条命令,要求这些鸦片船拔锚离开海岸,不得再返回天朝帝国的水域,否则将被彻底消灭。

以前这样的命令还有一些威慑作用,但现在一点效果也没有了。传令兵带回来的消息称,“那些外国船只都是全副武装,它们不肯挪地方”。这样的消息足以让带队将领冷静下来,不再逞勇,于是他便陷入一个两难的境地,他既不敢向这些外国蛮夷的船只开火,又不能任由它们留在当地。如果他不能把它们赶走,要是报告到总部去,势必对他的英勇形象造成损害。带队将领转而换上另一种腔调,他请求鸦片船的船长们帮忙,把船开到外海去待那么一两天,过后他们就可以把船再停回到原来的地方。鸦片船的船长们同意了这一请求,第二天早晨他们便起身把船开往外海。一旁瞭望的中国军队,于是又是敲锣,又是放枪,发出震天声响,他们跟在鸦片船后面,直到很远的地方。带队将领这时向他的政府递送了一份报告,大意是说,经过一场与外国蛮夷的大战,他已经把他们驱离中国海岸,甚至很有可能,他会在报告中说,他把几艘蛮夷的船轰成了碎片,另外一些则被击沉。而就在这份报告还在送往北京的半路上,鸦片船就已悄悄地回到其原来的泊锚之地,一切都照旧进行。这就是中国人处理事情的典型方式。同时,他肯定也会向北京报告,说进犯岛屿的夷人已被赶走,甚至无中生有,说发生了一场战斗,俘获并摧毁了一些夷人的船只,以此来夸大渲染他的光辉成就。这就是中国人的办事方式。(福琼,2015:119-120)

不得不说,福琼把中国官员与军队那种虚张声势、外强中干、色厉内荏、欺上瞒下的特点写得活灵活现,也非常准确。可是,他没有批评西方鸦片走私商人的蛮横无理,在装备有当时最先进武器的武装鸦片走私船面前,落后的清朝海军无力将其驱赶,得罪不起只好用上这种委曲求全、欺骗自己的方法。福琼抓住了中国军队的行为特点,站在西方的立场上,他只要掌握这种特点就行了,在讨论、考察中国社会特点时,他们不需要站在中国社会的角度上,采用一种符合对象自性的方式来进行考察,而仍然是用西方的那一套理念和标准来衡量中国的价值观和办事方式,并以此而得出所谓中国社会的特点。比如中国军队的假模假样,在当时势态之下,中国军队可能确实有这样的表现特点,可是西方游者却不会深入考察,假如不是这样行事,又会产生何种可能。因为这些特点的得出是通过西方标准衡量而来,自然不合乎西方的口味,所以他们对这些特点并不抱有同情之了解,而是批评、贬低,并没有站在中国文化的角度。

西方游者对中国人、中国社会特点的判断总结,有些可能确实有亲身考察的依据,但还有些结论可能推测的成分更多,这就与无根据地贬低没有什么区别了。“当中国人想要达成一个目标时,他们唯一考虑的是,是讲真话有助于目标的实现,还是讲假话?哪种办法更能实现目标,他们就选择哪种,也许,他们稍微偏向的还是讲假话。”(福琼,2015:197)“这就是中国人的品格。他们不会跟你讲实话,除非这符合他们的利益。实际上我常常认为,如果对他们利益无损的话,他们更愿意说假话。”(福琼,2015:269)“许多中国人一点原则性也没有,为了得到眼前的利益,他们可以欺骗性十足地把自己变成一个名义上的基督徒,或者别的什么,可是第二天,如果给他们一点诱惑的话,他们又可以变成一个佛教徒。”(福琼,2015:112)很显然,福琼这样的论断以偏概全,带有很强的个人偏见,他没有耐心也不愿意去了解更多

的中国人,也丝毫没有考虑到中国社会的复杂多样性,也许他确实是通过自己亲身经历的事件得出这样的论断,然后他就匆匆忙忙给中国人贴上一个标签,就像是在实验里给某种物品作出鉴定一样:啊,中国人就是这样,这就是他们的办事方式。也许,他对实验室的物品抱有的态度都更有耐心,抱有更多的同情和爱意。

其实,这种态度本身就表明福琼内心对中国的一种排斥,对中国及中国文化采取一种完全视为他者,难以交流、难以变化。将中国看做是化石,摆出一副摸清了中国人中国政府办事特征的样子,这其实是西方汉学的一种潜在意识,即把中国看成是一种业已僵化死去、没有生命力的东西。在强调中国特点的同时,也强调这种特点的独特性,其他地区没有,因而是奇异的、病态的。“最奇怪的是,唱戏,或者说演戏,这种中国人特别喜欢的娱乐,竟然也经常是在寺庙里进行,这与我们西方人的宗教观念和礼节观念可是差得太远了,不知怎么地,我们天朝上国的朋友们在很多方面都与我们恰恰相反。”(福琼,2015:69)而这些奇异的病态的特点反过来又成为中国的象征。正如英国学者博埃默所说,像福琼这样的旅行者和殖民者“所凭借的就是他们手头所掌握的程式化的描述和具有权威性的象征,然后又把这些描述和象征在他们之间散布”(博埃默,1998:14),就在这个过程中,中国形象渐渐凝固成型。

三

写作模式的第二种,是把中国说成是更早版本的西方,比如说中世纪时的西方,或者是封建时代的英国某个地区。中国与西方国家空间距离遥远,如何让游记读者们感知到这种空间距离,其中一个做法便是将空间距离转化成时间距离,将另一个空间中的国家比作更早时间的母国,从而方便让读者们产生一种切身的感受。福琼在其描述中国农村建筑的文字中,便有类似的做法,他将中国农村与中世纪的苏格兰农村相比。“中国人的房子一般都是用土坯和石头砌成,质量不好,房屋地面则是潮湿的泥土,其居住条件就连安置牲口都颇为勉强。这样的房子以前苏格兰也有,但是谢天谢地,如今它们都尘封到历史中去了。我这位新朋友的房子也不例外,关不严的、松松垮垮、吱吱呀呀的门,又脏又破的纸窗,鸭、鹅、鸡、狗、猪,屋里屋外满地都是,显然,对于这儿,它们和主人一样,享有同样的主权。”(福琼,2015:41)又比如,提到中国乡镇之间的械斗,“沿岸各个乡镇的村民之间也经常发生械斗,在这方面,他们倒与封建时代英国边境上的那些边民类似,那时候,强权即公理。与那一时代类似的还有,这儿的中国人也干一种类似于敲诈勒索的勾当,一方支付一定的保证金给另一方,然后双方达成和平协议”(福琼,2015:25)。这样又破又脏的房子只在古代苏格兰才有,这种敲诈勒索的行径也只有封建时代的英国才有,而中国竟然都还保留着,言外之意不问可知。

福琼写作游记的时候,虽然达尔文的物种起源说还没问世,但作为一种普遍观念,人类社会线性进化的看法一直就存在。按这种线性进化的观点,所有文化都是按照同一发展方案,朝着一个共同的方向不断提升自己,比如从野蛮到文明,或者按马克思后来的说法,从原始社会、封建社会再到资本主义社会,就像人类社会在科技方面不断取得的进步一样,最终各个社会都达到同一个终点。这种观点一直到美国人类学者博厄斯的出现,才产生了一些改变。如果用这种观点来做背景,那么把中国看成是一个早期的西方版本,潜台词也就是说,中国比西方落后。

西方作者的游记中有时也换用另一种表达方式,但主旨与这种模式是一样的。他们偶尔也会在中国找到一个难得的好地方,让他们感到满意,而这个地方足以让作者想起自己的遥远家乡。比如福琼对上海郊外印象很好,他写道:“这一地区不仅土地肥沃,而且农业发达,相比于我到过的中国其他地方,这儿看起来更像英国一些。在这儿,你可以看到像英国那样用来堆放杂物的农家场院,同样的建筑样式,同样的茅草屋顶。田里面一道垄,一条沟,布置方式也和英国一样。如果没有那些竹子、当地人头上的长辫子以及他们平常所穿衣服的提醒,说不定你还误以为自己在泰晤士河畔呢。”(福琼,2015:72-73)

将中国比作更早版本的西方,其用意是想表达或建立一种优越感,表面看不过是时间先后,实质是水平的高低。这种优越感的核心,或者说,优越感的基础还是科学技术水平的高低。比如农业技术,福琼总结道:“毫无疑问,作为一个国家,中国在农业技术上要超过印度土著或其他一些半开化的国家,正如中国在很多民用技术上取得的成就一样,但如果要拿现在的中国农民来和我们英格兰或苏格兰聪明的农夫们相比,那是很可笑的,这就好像拿只能在沿海航行的中国帆船来和英国海军相比,或者拿中国商人与英国商人相比,后者的船队可以到达全世界每一处洋面,商业活动遍布全世界每一个角落。”(福琼,2015:152)东方主义的色彩不可谓不浓。

按照东方主义的观点,既然中国按照科技水平或者文明程度来衡量比较落后,在线性进化的时间表上属于落后国家,那么,西方帮助中国现代化也就是合情合理的,不光是合情合理,而且也有道义上的要求,这样,西方开采、抢夺中国的资源,也就不会有道德上的负担,就好像成年人监督、教育小孩子,让小孩子做得更好一样。福琼在游记中就经常表达类似的想法。比如关于中国内地的开放范围,站在福琼等人的立场上,开放范围当然是越多越好,西方商品不受阻拦地进入中国市场也是理所当然的,福琼评论道:“我们通过上海进出口的货物,在经过杭州时,当地的地方政府便凭着有利的地理位置,对这些货物百般刁难,他们扣留我们的货物,向货物非法征税,种种敲诈勒索,来自于商人们的各种抱怨不绝于耳。终有一天,那些有关外国人不能越过租界活动的愚蠢规定会被清除干净,那时候,我们就可以在中国境内自由地贸易、旅行,就像在别的国家一样,这一天不会离得很远。”(福琼,2015:234)为了这一天的到来,在福琼看来,甚至不惜使用战争:“但毫无疑问,若干年之后,中国将会发生巨大的变化,也许另一场战争及其惨烈后果难以避免,一旦这些情况发生,这个庞大的国家就将对所有外国人开放。到那时候,基督教会的传教士们就可以把他们的传教事业拓展到我上面描述的偏僻的武夷山区来。”(福琼,2015:397)

四

西方作者,通过他们对新发现世界现实的描绘,对其历史、文学、文化产品的批判性分析,在其中产生出一种可以支配、重构东方的模式,这一模式把中国看成是一个固化的难以交流的客体,认为把握这个客体的特性就可以轻而易举地控制它。同时,又把中国看作是西方的更早版本,也就是把中国看成是线性进化过程中的落后地区,西方于是便可以理直气壮地以自己的方式来改造中国、“帮助”中国,而不必带有道德上的负罪感。通过这两种模式的有意识地重构,西方建立起了对于其他地区也包括中国的全方位的话语霸权。也就是说,东方主义可以看作是组建了一个知识分支,这个分支给西方话语霸权提供了一个基石,其中就

包括十九世纪下半叶这些西方旅行者的东游游记。福琼的游记无疑是其先驱和代表性作品。

参考文献

- [1] George W. Stocking. *Race, Culture, and Evolution: Essays in the History of Anthropology* [M].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68.
- [2] Dennis Porter. *Haunted Journeys* [M].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1.
- [3] 赫德逊. 欧洲与中国 [M]. 李申等译. 北京: 中华书局, 1995.
- [4] 乔治·马戛尔尼. 马戛尔尼使团使华观感 [M]. 何高济、何毓宁译. 北京: 商务印馆, 2013.
- [5] 萨义德. 东方学 [M]. 王根宇译.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1999.
- [6] 福琼. 两访中国茶乡 [M]. 敖雪岗译. 南京: 江苏人民出版社, 2015.
- [7] 博埃默. 殖民与后殖民文学 [M]. 盛宁、韩敏中译. 沈阳: 辽宁教育出版社, 1998.